

周恩来同志大革命报告

孙中山在我们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民主派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但不论在思想上、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上，都保留他动摇性、妥协性的尾巴。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接受了我們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同时他又想把建国大纲拿到代表大会通过，因受到我們的反对而未果。以后他又好几次拿到全会去讨论。特别是当那次会我們出席的人比较少的时候，他更是硬要拿出来。商团事件孙中山开始也是动摇的，想和陈廉伯妥协。只有羣众起来向陈廉伯作了双十节大游行示威，才动摇了他走向坚决了。其中特别重要的，倒是商团的几千多枝枪吸引了他。当时他前有商团，后有楊刘，給予他生存一个很大的威胁。商团倒要公开要求孙中山下野，邀請陳炯明回粵主政。在这样生存威胁下，他才挺而走險地与革命羣众站在一起，坚决的解决了商团事件。在另外一些事情中，也同样表现了他的保守性、反动性。他虽然比起蒋介石来是要容易听听別人的話，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主張民主的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总理，他常常以总理的資格駕凌于各种委员会之上，不顧大家的意見，有些事情常取决于他个人的意見。这也就是蒋介石下台的由来。孙中山的北上，得到了我們很大的帮助，表现了他的革命性，但同样也暴露了他的动摇妥协性。他仍不忘情于日本。而且在东京做了大亚細亚主义的講演（虽然其內容是革命的），这个口号成为汪精卫投降卖国的汉奸旗帜。

国民党不只思想上靠着我們为之复活与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組織上也是依靠着我們，才得以在各省普遍建立，普遍发展。三民主义，

国民党也是靠着我們才得以普遍影响于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以后，在我們党的努力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地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們同志的努力而建立与发展。当时各省国民党主要负责的人，都是我們的同志：湖北党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湖南先是××同志，后是夏曦同志，浙江是××同志，江苏是××同志，北方是于树勋（那时是同志），是我們把革命的青年吸收到国民党中来，是我們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左派国民党在各个地方都是占着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就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北上时，也正是我們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的依靠，孙中山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传到北方来。

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的就形成各种派别，在思想上也自然而然的形成各种三民主义。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就是广东买办代表冯自由、謝持这些人。这些人在改组时被孙中山痛骂出去，并开除了党籍。改组首先受到他們的反对与破坏。那是不奇怪的。因为革命在广东发展，革命的锋芒就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侵犯依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的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孙中山死了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党革命的，就是西山会议派。他們公开的分裂出去，成立他們独立的组织。他們大骂广东的国民党，大骂廖仲恺（资产阶级左派），污蔑广东被赤化。但一般的不反对蒋介石。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的工作。他們也替

略就是打击廖仲凱，拉攏蔣介石，他們是看对了蔣介石。这些右派的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革命峰起云湧地起来以后，始終是反对革命的，但右派中有一个最危險的家伙，那就是戴季陶，他表面上不贊成西山会戴派式的分裂，他也在孙中山的遺囑上签了字，他表面上說要維持国民党的統一性，但他采用了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內部来分裂国民党的陰謀。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孙中山的反动性，写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抽出了孙中山的一切革命的东西。他大講道統，說孙中山道統繼承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他見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講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講到广东，又从广东講到上海。他到黃埔去講演，进行分化黃埔的工作。在他講演以后不久，一九二五、四、二十四日，黃埔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右派的組織）。另一个右派头子，就是孙科，也是同样显著的資產階級两面派，他表面上有时贊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即如抗战期間，他有时主張民主，实际上他主張党治。他的民主是党治的民主，是五五宪草式的民主。中派表面上与我們合作贊成革命，但不是真心和我們合作。随时的提防限制共产党，这就是蔣介石。他实际上与右派合作的，实际上是右派力量的組織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短时期內，他算是中派，但在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

筹办黃埔的經過是这样的：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在孙中山部下比較带来一点革命性的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又墨的系統，大革命时代的張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誠，都是出自这里。开办黃埔應該就是孙中山軍事投机失敗的結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軍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革命以后，他的新軍运动变成了向軍閥进

行軍事投机。会党运动则变成土匪运动。他的軍事投机。完成了与軍閥的互相勾結，互相利用，因之其結果就是宣告悲痛的破产。会有这样的事实，广东有一个大軍事騙子，他自己一个兵都沒有。有的都是別人的。他的軍隊平常都不用，只有在檢閱那一天拿出來用一下。孙中山的軍事投机投到这个騙子手中去了。有一天孙中山要去檢閱这个軍隊，这个騙子于是躺在他的烟床上，派了几个付官，去別的軍隊里借來了兵士。而且賞得都是好槍。孙元帥檢閱完了大为滿意。后来孙中山要打惠州，下令要这个軍隊出发，这个騙子毫不含糊的答应了。借來的兵士耀武揚威的在孙元帥面前走過來，等到孙元帥看不見的時候，都各回原隊去了。但这个騙子却派了几个人去前方偵察战况。如果是打勝了，他便立刻到孙元帥那里報頭功請賞。如果是打敗了呢，便轉來請求元帥給予补充。軍事投机的破产，教訓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共产党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軍隊的重要，并接受俄国顧問的建議，乃于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黃埔軍校，决定由蔣介石当校長。蔣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校長呢？蔣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参加革命以后，始終跟隨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組織中华革命党，要求誓詞上打手印，許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漢民、汪精卫都不干了，黃克强則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后来孙中山与宋庆齡結婚，整个同盟会都为哄然不滿。也就是陈其美第一个贊成这件事。因之陈在当时是得到孙中山的信任的。蔣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此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艦的事情。蔣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砲殺元帥府，赶走孙中山。孙中山坐在永丰艦上相持到五十日当时蔣介石在上海交易所生意失敗了。看到这个机可投，乃从上海特意（接下頁）

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所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也常以此事做为他是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总理赴难的证据。后来孙中山与苏联关系建立以后。因邓星等离不开广东。乃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校长。蒋介石开始办黄埔时。虽然表面赞助革命。但他的思想是反共反苏联的。不是真心诚心的与共产党合作。苏联顾问为了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地拂袖而跑回上海。当时黄埔学生有六百人。大部分都是经过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员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中十分之一。那时他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同时他的军阀思想就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赴最为人所不耻的王柏龄办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有些骨气不足。做奴才的邓演达容不下。但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命令。他用人的方法。就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另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去牵制另一个左派的。他组织上办法。也是一样。用反共产的牵制共产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利用周恩来同志。第二师师长汪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恩来同志推荐我们的同志鲁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而用了右派的×××。第三师师长×××是右派。他就用鲁同志为党代表。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成立了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占少数的。左派占了极大多数。廖仲凯

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本国的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少，所以更多的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在商团事件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的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推动农民的斗争。虽然他政治斗争中，仍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我党的力量仍有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其自己独立的立场。把一切意见做为自己的意见而提出，他是坚强的资产阶级左派的代表。汪精卫是脆弱的资产阶级。当他还革命时，他会很好的把苏联顾问和我们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很好的革命留声机。胡汉民思想上是右派，虽有时也可与左派妥协。但有他独立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则他是知情的。谭延闿思想上是右派，但因利害关系上，蒋的军队力量日渐发展，他想发展他的实力。所以在实际行动上与左派靠近。朱培德有时靠近汪，有时靠近蒋。程潜也是因为要想扩大他的军队，而靠近汪。但这些人总的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民众。那是民众运动在广东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但一旦民众，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时，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来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没有的。在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全局的在我党只有毛主席。他这时一直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整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正是这些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两湖各地而发动了各省广

大的农民运动。革命在这一年的大发展，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回来，肃清了杨刘。在沙基惨案中，即已看到蒋介石的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周恩来同志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死了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面，实际上则是包含着他个人利害的争夺。因为胡是代帅，许为军事前辈，他就无从提高他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第二次东征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已大为发展，农民自卫军先在军队去以前，就占领了县城，并自选彭湃同志的哥哥为县长。而蒋到时，已成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的畏惧与动摇。特别是当时黄埔内部，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的发展；军队中三个师党代表，我们占二人，九个团代表，我们有七个。同时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又有了我们党的组织的发展。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这一切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以至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一个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在会场上竟公开表示他的黄埔不可分裂，要求在黄埔以及在军队中的党员，把所有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周恩来同志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把他搪塞过去。而后来在他与周恩来同志个别谈话中，竟更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的统一，或者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员退出黄埔与国民党，并假惺惺表示这是他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恩来同志回来和陈延年同志，以及熊罗庭商量。当时党的政策。本来是决定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计划在第二次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执委中我们党员选出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的问题上，当时的实际情况，蒋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汪懋功接近左派的汪精卫，此外都不是蒋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部下撤退。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恩来同志带着这个意见回去，并等待中央电报，立即正式向蒋提出。当时二次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的优势，上述政策计划的实现，完全是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惜中央居然又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特地打电广州把二次大会延期一月，以相等候，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做二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大包办了左派，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而让左派也独立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做极大的让步。所以选举的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我们只有七个，让了一倍，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这些人算起来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则占了十五个。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樞、萧佛成等都当了选。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的多数。国民党的执监委员会是常常合在一起开的，所以结果完全成为：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机会主义政治上对右派中派第一个最大的让步。

这次大会以后，在实际行动上，我们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

鮑羅庭回国去了。加倫又到馮玉祥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問我們还帮助不帮助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但另一方面，这时右派却紛紛回粵。張靜江、陈立夫等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紛紛回来，向蒋介石进行挑撥与勾結。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近因，这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近因，則完全是伪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借口把汪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要恩来同志回来，恩来同志因看到蔣与右派的来往和他的气色不好，报告張大雷同志。当时的顧問××不重視此事，把一个大政治問題当做小問題，而儿戏視之。陈延年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才回来，因此方針上也掌握得不大熟。

李之龙是个党性不純的党员，当时做永丰艦的党代表，他抓住了陈英（海防司令）和欧阳格私販大烟，报告于汪精卫。汪下令把欧阳格撤职拿办，并任李代理永丰艦长。陈与欧阳格都是蔣的人，自然也向蔣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挑撥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这說就永丰艦要砲轰黃浦。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逮捕李之龙，把黃浦戒严。下令監視各师党代表，包圍苏联領事館，監視苏联顧問，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糾察队的武装，把周恩来同志也軟禁起来。蔣与右派密切来往，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对蔣不滿。朱培德、李福林會有些动摇，但各軍都想与蔣干一下。如果这时党的政策是給予蔣以有力的回击，毫无問題。事情是有办法的。

但当时采取了繼續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蔣这时是不敢分裂。不懂得这是交易所老板右傾意見，以为蔣会因此而分裂，乃向蔣說明这是誤会。蔣于是也乘机立刻放下，表示誤会，这是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蔣介石的大让步，这是軍事上的大让步。为了解釋誤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譚延闓、苏联顧問都客气的表示了歉意，而蔣介石倒反而一句話都沒有說，精神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的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大家都束手无策，只好于革命以进攻。我們沒有給他有力的回击，蔣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伍朝樞。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到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粵，恰好与失踪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蔣介石用打击左派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用打击右派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流氓手段最阴險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蔣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蔣在这个时候，乘机把广东的革命青年軍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們的党员从第一軍以及黃埔撤退，三面来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退出第一師的有二百五十多，其中第一个有蔣最得意的学生蔣先云等，只有三十九个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菴。从此以后，第一軍的元气完全丧失，而其战斗力一落千仗了。

蔣介石在我们党内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軍事上的地位，接着又向党务上展开对我们的进攻。这就是五月二十五日二中全会上党务整理案的提出，其目的完全就在压迫共产党，这个提案主要内容为：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会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手创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有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是不难给予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只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掌握在我们和左派的手中，而蒋介石在这个时候，也不敢决然分裂，他必须要利用（以至右派戴季陶还称鲍罗庭为圣人）。但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在组织上派了彭述

之。張國燾两个宝贝来指导二中全会的党团。在党团会议上討論接受党务整理案。彭述之是到处引經据典証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又怎样办。他一点办法也沒有。他說大家討論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見时。他又引經据典的說这个不行。那个錯誤。如此討論七天。毫无結果。到后来張國燾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簽字接受。这样我們又在党务上做了第三次机会主义的大让步。而右派的蔣介石則占了极大的优势。把張靜江捧出来做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他是陈果夫的傀儡。蔣亲自做了組織部长。新設軍人部长也是由蔣兼任。組織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們好几个部长（宣傳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

我們党务方面毫无地位了。而陈果夫。陈立夫便便的利用他們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維汾。王法勤的大同盟为基础。收买西山會議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到此蔣介石全然在政治上軍事上党务上接連的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只要我們善于进攻。蔣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被压制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蔣直系还只有六个师。一共八个軍中。他只占一个軍。第二軍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四軍党代表是罗汉（那是还是同志）。第六軍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但机会主义的领导。繼續在北伐时犯了极大的錯誤。

北伐时。軍事上有绝对的把握。有精密的計劃。加倫保証在双十节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倫曾請 恩来同志轉問中央。在北伐中还是帮助蔣介石呢。还是削弱蔣介石。这一政治問題如何解决。恩来同志到了上海。去請示中央。陈独秀說你們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謙虛。原来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調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

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有张国焘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整个北伐战中到三中全会以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其结果也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直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X师首败于XX。而王柏龄进攻南昌时，则全军复没，王柏龄、缪斌等全被俘虏。这对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的陈独秀，却没有领会这些事实，而终止他的错误。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汪兆铭、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宋庆龄、谭平山、陈公博、于右任、恩克巴图、程潜、朱培德、徐堪、顾孟余、程潜、宋子文、丁惟汾、戴传贤、李济深、林祖涵、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陈友仁、李烈钧、王法勤、杨乾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柏文蔚、刘守中、何香凝、伍朝樞、蕭佛成、孙科。

候补执委

白云梯、毛泽东、许楚琬、周启刚、夏曦、邓演达、韩麟符、路友于、黄实、董用威、屈武、邓颖超、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缪斌、吴铁城、唐大勋。

监察委员

吴敬恒、张人杰、蔡元培、古应芬、王寵惠、李煜藻、柳亚子、高语

平、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

候补监委：

黄绍雄、李宗仁、江浩、郭春涛、李福林、潘方超、邓懋修、

谢晋。